

不能把文学艺术完全交给流量逻辑

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
取决于它有没有写出人

前沿观潮

访谈嘉宾



曾大兴

广州大学教授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编者按

当前,大量网民参与短视频的内容创作,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真正进入了全民创作的时代。在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上,层出不穷的大众创作让文艺领域更加丰富、更接地气,同时也彰显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多年来,他系统性地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框架,把文学放回它赖以生长的土地上去理解,同时也关注文学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感知和想象空间的方式。基于其研究背景,我们与之探讨——当文学“上网”后,在短视频的虚拟世界中,一片新的地理图景是否正在发生?

记者:很多人认为短视频是“快餐”,“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五分钟看完一本书”已是常态。但近年来,短视频平台上也涌现一大批优秀的大众创作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剪辑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过去,我们常认为文学只能通过文字、电影、电视剧等方式来呈现与传播。如今,经典文学的全民二创时代到来了,素人写作兴起,不少诗歌在短视频出圈。在您看来,短视频创作和文学本身有关联吗?就您的观察,什么样的短视频创作可以称得上文学创作?这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又带来哪些影响?

曾大兴:无论文学的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写作工具如何变化,“文学是入学”这个根本属性不会改变。文学如果不关注人性,不表达人的喜怒哀乐,不体现人对现实和历史、自然和人类、个体和社会等的思考,它就不是真正的文学。这个定义,是我们判断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的根本标准。

短视频和文学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不是所有的短视频都和文学有关系。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内容是信息、娱乐、营销、情绪刺激,这些不能叫文学。什么可以叫文学?不是用了文字就叫文学,不是拍了故事就叫文学,而要看它是否写出了人的处境、人的情感、人的思考、人的精神追求。

今年年初,55岁的贵州阿姨祝新雁在短视频平台走红,视频获赞近千万。她的视频画面很朴素,镜头也没有专业性可言,走红的秘密藏在文案里。网友开始呼唤“老辈子文学”。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短视频这种载体,并不排斥文学。祝新雁的文案之所以能打动人心,不是因为她是“素人”,而是因为她的文字里有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具体的情感。她写的是她自己的生命经验,而这种经验具有可通约性——别人能从她的文字里看到自己的外婆、自己的故乡、自己回不去的过往。

短视频里有没有文学,取决于它有没有写出人。没有人的地域文化,只是标签;没有人的短视频,只是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所谓“文学性”内容,其实是用现成的符号和情绪填充的。“县城文学”的滤镜配方,“乡愁”的标准意象、短视频文案里的“妈妈的味道”“回不去的故乡”,都属于这一类。

短视频对整体文学创作的影响有两面。积极的一面是,它让更多过去被忽略的人发声,让文学的地理版图扩大了。消极的一面是,它可能拉低文学的标准。

地域文化的真正复兴
是本地人重新成为文化的主体

记者:短视频平台上,有非遗文化元素或强烈地域特色的内容正在走红。快手非遗视频年播放量达1332.9亿次,内容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抖音非遗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达8065亿次。东北二人转、秦腔、福建民俗、敦煌壁画以及各具特色的方言等相关内容,让地域文化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新的生命力。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曾大兴:这个现象是“地方性”在数字时代的重新可见化。过去,地域文化主要通过地方志、地方戏、方言、文学(民歌、竹枝词等)、民俗活动等来传播,范围很有限。现在短视频平台给了它们一个几乎无远弗届的展示窗口。东北二人转、秦腔、福建民俗,过

去可能只有本地人或者专门研究者关注,现在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用户都能看到。这是好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地理壁垒。

但“被看到”不等于“被理解”。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是流量逻辑,它会把地域文化中最具视觉冲击力、最容易被快速消费的元素提取出来,放大、重复、标准化。东北二人转中最搞笑的部分被剪成十五秒,秦腔中最悲壮的一声吼被做成背景音乐,福建民俗中最奇特的仪式被截成循环播放的片段。这些内容确实让地域文化“出圈”了,但出圈的是符号,不一定是文化本身。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地域文化在短视频传播中,是复兴了,还是被商品化了?如果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因为短视频重新对自己的地方戏、方言、民俗产生兴趣,甚至开始学习、传承,那就是复兴。如果只是外地人刷到觉得“好有意思”,本地人自己并不参与,那它就不是文化消费。真正的复兴,是本地人重新成为文化的主体,而不是本地文化成为外地人猎奇的对象。

短视频平台上的“县城文学”,以5.9亿播放量席卷全网,但很多县城内容却成了批量生产的公式化产品,出现被迫失真、同质化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用“快餐逻辑”来解释,快餐的逻辑是:用最少的成本,调动最大的情感库存。县城文学的标配是什么?破旧的街道、昏黄的路灯、骑自行车的少年、理发店、台球厅、小卖部、离开县城的火车。这些符号确实能唤起乡愁,但当它们被批量生产、反复复制时,乡愁就被标准化了。我所批评的不是“文学建构地方”,而是“文学建构得太粗糙、太雷同”。

这—问题是平台算法的必然结果。算法奖励的是那些能快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而不是那些复杂、暧昧、需要慢慢体会的地方性。所以,被算法选中的地方性,往往是地方性中最容易被标准化的部分。东北的幽默、西北的苍凉、江南的温婉、县城的破旧,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会被反复使用,直到失去生命力。

地方感不再只是故乡的馈赠
正被平台、算法、流量重新塑造

记者:您长期研究文学地理学,从山川地理的视角去关注文学的特点。在您看来,短视频平台上是否也正在产生一片“文学地理图景”?

曾大兴:传统的文学地理图景,是作家带着地理基因,在作品中呈现地方性。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作家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生命意识,再通过文字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文学。这种图景的生成,是从地理到人,再从人到文学。

短视频平台上的文学地理图景,其生成机制多了一层平台的中介。一个贵州阿姨写自己的故乡,她的文字先进入平台,平台通过算法把它推给可能有相似记忆的人,这些人点赞、评论、转发,形成情感共振。但我想说的是:平台是地理图景的再编码者,不是地理实体的生产者。平台能改变的是地方的文化意义被谁看见、以什么方式被看见,不能改变地方的客观地理基底。这就带来几个新问题:

一是谁的地理能被看见?算法推荐有它的偏好。它倾向于推荐那些能快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东北叙事、县城文学、西北风情,这些之所以在短视频上火,不只是因为它们有地方性,还因为它们的地方性符合平台的流量逻辑。一些更安静的、更复杂、更不“出片”的地方性,可能就被算法边缘

化了。

二是地理图景的“中心—边缘”关系变了吗?平台算法正在制造新的中心与边缘,只不过这种中心不是地理中心,而是流量中心、算法中心、平台中心。一个地方的文化能不能被看见,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它能不能被平台推荐。平台制造的“中心与边缘”是文化意义层面的,不是地理实体层面的。一个地方在算法里被边缘化,不等于它的地理实体消失了。

三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什么?过去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文学,今天还要研究平台、算法、流量如何重新塑造“地理感”和“地方性”。这不是放弃文学地理学的传统,而是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地方感不再只是故乡的馈赠,而是流动经验、媒介记忆、平台算法、情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组装”不等于“凭空建构”。组装的前提是有一个客观的地理基底,组装不能改变这个基底,只能改变它的文化意义。文学地理学既要研究“组装”的机制,也要守住“基底”的实在。

两个星期前,我写过一篇短文,《从两个赤壁说到两种空间观念》,发表在“文学地理学”公众号上。大意是:湖北境内长江沿岸有好几处叫“赤壁”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蒲圻赤壁,在长江南岸,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另一处是黄州赤壁,本名赤鼻矶,在长江北岸,跟赤壁之战本无关系,但因为杜牧的诗、苏轼的词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被后世塑造造成家喻户晓的“三国周郎赤壁”。同一个地名,分化为历史的地理空间与文学的想象空间。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空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的地理实体,一个是经由话语、文学不断建构的文化产物。蒲圻赤壁在文学传播中可能不如黄州赤壁“出圈”,但它的历史地理地位不会因此改变。文学地理学要同时关注这两个层面:文化意义的流动和地理实体的稳定。

慢阅读的空间被挤压
文字的力量不会被削弱,但会被分流

记者:您提到,祝新雁走红的秘密藏在她的视频文案里。在短视频时代,文字的力量会被削弱吗?还是反而会更显珍贵?

曾大兴:短视频平台的主流是影像。影像的优势是直观、快速、情绪化,但它的短板是难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一段十五秒的视频,可以让你笑,可以让你哭,但很难让你思考。而文字,恰恰擅长这个。文字需要读者主动参与,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空白。这种参与感,是影像很难替代的。

所以,在影像过剩的时代,文字反而因为稀缺而重新获得文学性和感染力。文学性正在从“载体”转向“内核”。过去我们说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今天文学可能存在于文字、影像、声音、弹幕、二创的混合体中,但它的内核——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书写——没有变。

我也要提醒一点:文字的力量不会被削弱,但会被分流。一部分文字走向快速化、碎片化、情绪化,成为短视频的文案、弹幕、评论;另一部分文字走向慢速化、深度化、经典化,成为需要坐下来慢慢读的文学。这两种文字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分层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两种文字都有空间。

我看传统戏剧,发现一个规律:慢的人,往往都是达官贵人,他们迈着八字步,走路慢,说话也慢;而快的是什么人呢?是跑龙套的,是跟班的,他们走路快,应答快,做事

快。今天也是这样,最快的人是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他们是辛苦人。而那些慢的人,往往是享受快递小哥服务的人。

戏剧中达官贵人的慢,是建立在跑龙套的快之上的慢。今天享受快递服务的人的慢,是建立在快递小哥被算法逼迫的快之上的慢。这种慢并不高贵。真正有质量的慢,不是让别人替你快,而是你自己对时间有支配权,同时不剥夺别人的时间支配权。

文学欣赏也是这样。应该坐下来慢慢欣赏。但这个“坐下来”,不是达官贵人那种让别人伺候的“坐”,而是自愿放下效率、进入沉浸状态的“坐”。这种慢,不依赖别人替你快,不建立在剥削他人之上。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争取的文学权利。

慢阅读的空间正在被挤压。在算法推荐和流量竞争的环境里,平台奖励快速反应、快速更新、快速互动,不奖励沉默、沉思、反复修改。哪些地方、哪些人、哪些写作方式,在快逻辑中被边缘化了?这是文学地理学应该关注的新问题。我们不反对快读,但我们更需要慢读。慢读是需要制度、教育、批评、出版、平台设计来保护的。我说“还需要慢读”,这个“还需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不能把文学艺术完全交给流量逻辑。

文学“上网”塑造的新地理图景
是复杂、矛盾、需要批判性分析的

记者:在人口高度流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地理环境对文学以及文学艺术家生命意识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曾大兴:人地关系在今天仍然存在,但它的表现形式变了。

每个作家都携带着他在自己熟稔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地理基因,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写作,这种地理基因都会由于相应的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对他的写作构成一定的影响。一个在武汉长大的作家,即使在北京写作,他的文字里仍然会有武汉的湿度、武汉的语感、武汉的市井气。

今天的人口高度流动,很多人不在故乡写作,他们的地方感是拼贴的、混杂的、多重的。地理基因在流动和媒介中会被重新激活、重新组合。短视频里的“县城文学”很多不是县城人写的,而是离开县城的人写的;不是写给县城人看的,而是写给有县城记忆的人看的。

所以,文学地理学不但要关注“地理基因”,还要关注“地理基因与地理组装的辩证统一”。我们要研究的,不再只是“地理环境如何影响文学”,而是“在平台化、算法化、流动化的条件下,人地关系如何被重新编码、重新体验、重新表达”。但无论怎么编码、怎么表达,地理实证始终是根基,文化阐释是在根基上展开的。这正是我在《从两个赤壁说到两种空间观念》那篇文章里讲的:实证约束阐释,避免阐释滑向无边的主观想象;阐释补足实证覆盖不到的文学精神层面。

文学“上网”正在塑造新的地理图景,但这片图景是复杂的、矛盾的、需要批判性分析的。它让更多地方性被看见,但也让地方性被商品化;它让更多草根发声,但也让发声停留在“内容”层面;它让文字在影像过剩的时代重新获得稀缺性,但也让文字被分流为快碎片和慢经典;它让人地关系以新的方式延续,但也让地方感从单一的地理基因走向地理基因与地理组装的辩证统一。文学地理学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考辨山河地理之实,也要读懂文学赋予山河的万千意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见习记者 周雨霁)

AI时代,为何需要工匠精神

□ 尚文杰 周蜜

最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其精湛技艺令人叹为观止,生动诠释着工匠精神。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工匠精神并未被技术浪潮所湮没,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激励青年一代精进技艺、成就出彩人生的精神动力。

工匠精神是算法无法凭空生成的

正如奥林匹克格言高度凝练了体育精神一样,这场被誉为“技能界奥运会”的盛典也跨越了项目与语言的界限,向世界生动诠释了属于技能领域的共同信仰——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肇端于人类的技能活动,激励着人们不断提高技能水平。在日复一日的切磋琢磨中,劳动者将智慧与汗水倾注于指尖,从最初的“熟能生巧”,逐渐沉淀出对极致的执着,进而淬炼成工匠精神。而这种精神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指引技能迭代的灯塔,驱动劳动者打破常规、挑战极限,在毫厘必争中不断攀登技艺高峰。智能时代,机器固然能在算力上实现指数级突破,但这种在真实劳动

实践中孕育、在血肉之躯磨砺中凝结的精神特质,是任何算法都无法凭空生成的。

工匠精神既是一种精神动力,也是一种道德规范。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它激发劳动者在面对技术壁垒时敢于攻坚克难,在应对枯燥重复工作时能够坚守初心,将职业视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去追求;作为道德规范,它内化于劳动者对产品质量的敬畏、对使用者的责任以及对职业操守的捍卫。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试图以“标准化”“批量化”重新定义生产效率的当下,这种敬畏与责任显得尤为珍贵。

深挖那些不能被取代的“真手艺”

世界历史上,工匠精神有许多典型形态。有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取人气质,有聚焦手工业、以艺术为本位的匠艺精神,也有立足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具有高度普适性的新时代工匠精神。但整体上看,工匠精神是人类运用自身的体力、目的、计划、智慧等本质力量创造事物,逐步挣脱自然奴役,并最终取得对自然胜利的精神特质。无论形态如何演变,其社会功能始终聚焦在劳动中发挥人的本质力量。

人的劳动具有创造性,创造性的劳动促使生产力发生质变。人工智能回答的生成过程是对人类思考的拟象,并不具备人脑机能特有的创造性。因此,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许多职业的基础执行环节,但这反而会激活工匠的创造性,让他们深挖那些不能被取代的“真手艺”,甚至发明新的劳动形式。例如照相技术的问世,虽然取代了传统绘画的“纪实”职能,却倒逼画匠们向着更具思想深度与审美意蕴的艺术境界探索,催生了抽象艺术。

从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只能依靠人类的力量。工匠精神蕴含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勇气和信仰。人工智能的回答基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而要攻克未知的领域,仍需人类自己躬身入局。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省选手郭夏亭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中的摘金表现尤其亮眼。该赛项是新增项目,她只能对标国际口腔医学行业标准自行摸索,每天从早上8点训练到凌晨,起泡、磨破、最后结成硬茧的指尖,帮助她夺得桂冠。这种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探索与身体力行的淬炼,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写照。

生产的成果能否服务于人,依赖人类自身的价值自觉。工匠们对极致的追求、对产

品倾注的情感,以及对使用者负责的态度,使技能活动成为富有人文关怀和理想抱负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先进的劳动工具,人工智能固然具备强大的运算逻辑。它或许能圆满作答“怎么做”的工具理性之问,但永远无法回应“为什么做”以及“做成什么样才最符合人类福祉”的价值理性之问。在智能技术逐渐抹平基础操作门槛的当下,技能活动的内在动机、情感和价值追求更显重要。人类决策的价值,正在于展现这些超越技术的“人之为人的特质”。

让工匠们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在AI时代,面对劳动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应当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让技能真正成为劳动者的立身之本、自信之基、致富之路。

在观念上筑牢“技能宝贵”的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多次在不同场合与技能人才交流,称赞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指出“光图设计得好还不行,最后要落实到焊工手里”,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在智能化浪潮中,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宣传与劳模表彰,提高人们对“技能宝贵”“技能不可替代”的科学认识,破除片面的“AI万能论”。只有让人们对掌握技能的前途充满信心,才能吸引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在教育上拓宽产教融合的培育新路。工匠精神的传承,既要在产业里,也要在校园,应进一步发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贯作风。一方面,要将劳动教育与工匠文化深度融合高校思政课与通识教育,从源头上涵养青年学子精益求精的品格;另一方面,要纵深推进职业教育与成人继续教育的体系化改革,使教学活动与生产活动有效衔接,培养懂技术、精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在政策上畅通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弘扬工匠精神,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更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制度设计。要加快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实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并在落户安居、社会表彰等方面向高技能人才倾斜,让新时代的工匠们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不断壮大自觉学习技能、善用技能谋生的工匠队伍。

(作者分别为湖北工业大学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